

# 清代普陀山贡莲初考

□孙峰

## ►雍正年间的普济寺住持源正进呈“瑞莲”

该批档案中,最早向大清皇帝敬贡白莲子的是普陀山普济寺僧人源正,这也是这批档案中唯一的僧人所奏档案(其他都为官员身份)。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一,源正有“奏为普陀寺万叶瑞莲结子循例敬进并请圣安事”。从这一档案标题来看,“循例敬进”说明普陀山白莲子的进贡由来已久,雍正十三年也是按照惯例所献。雍正十三年这一次贡莲之事,杭州织造隆升也有一件题为“奏为恭代进呈白莲子事”的档案。今从普济寺僧人源正进呈“瑞莲”的档案内容看,里面的奏言很短:

南海普济寺臣僧源正、法雨寺臣僧明智跪请

皇上圣躬万万安,切普陀寺海印池内所有万叶瑞莲成颗结子,今循例敬谨进

呈谨奏

雍正拾叁年拾月初壹日

奏报的后面,有一个“览”字,估计是雍

正皇帝御批。这一批瑞莲的敬贡,是普济寺住持源正、法雨寺僧人明智一起实施,同时借此祝“皇上圣躬万万安”。

源正和明智都是普陀一代高僧,对普陀观音道场的兴建颇有功劳,历代山志有传。

中赞源正,号天庵,湖广衡阳萧氏子。母罗氏,夜梦一老媪,手提鱼篮入门,遗一鲤鱼,觉而有孕。幼岁啼哭无常,闻金玉声即止。其父母屡次为他算命,都说寿数有亏。恐他早逝,其母忍泪含悲,将他送入杉福寺,在信先僧处剃染。二十二岁,心有所感,忽起参方之念,就往德山礼宾日,禀具后,从讲席习律,参遁云、频吉诸善知识,发明心要,于是遍游湖海。后得法于普陀绎堂和尚。

雍正七年己酉夏,受当道护法、合山耆宿公请,源正任普济住持。雍正年间,中赞源正不辞劳苦,协理官府兴建、修复大批殿

宇,事迹载于碑刻。寂后塔于龙沙庵上。

法泽明智,俗姓许,福建漳平人。19岁受具足戒,历参名宿。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到普陀,受法于璿玑禅师,慧性圆明,顿悟玄机。雍正二年(1724)任法雨寺监院,戒行严卓,办事练达。雍正九年(1731),赐帑金重修前后二寺,法雨寺住持乐道以年迈告退,合山公举明智为法雨寺住持,经理钹工,有条不紊。历三年,全山殿宇,焕然一新,赴京谢恩,雍正大悦,赏礼优厚。

莲子虽小情意浓,普陀贡莲与普陀僧众感恩康熙、雍正鼎力支持佛国重建有关。康熙年间,朝廷屡发帑金,重振普陀道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朝廷帮助修建普陀寺,皇帝赐额“普济群灵”,始称普济寺。康熙去世后,雍正皇帝同样很支持佛国建设。普陀山最大规模的重兴工程,是在雍正九年至十一年(1731—1733),这三

年时间,发帑金七万两,广集工匠2000余人,由原任户部左侍郎王玘监督工程,34名文武官员参与,重修普济、法雨两寺院,规模宏敞,沿袭至今。当时的普济寺住持正是高僧源正。源正劳苦功高,雍正十二年(1734)十二月,钦赐紫衣给普济寺住山行者心明,方丈源正等。次年,源正等借进呈“瑞莲”的机会,特祝雍正皇帝“圣躬万万安”,这也是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

早在雍正九年九月,御赐帑金七万两扩建前后两寺,中赞源正望阙谢恩,上堂拈香祝圣毕,曾说法道:“接诏迎恩个事,若天高地厚;建功立业源流,似山远水长。瑞气霭梅岑,祥光凝正趣。今晨丹诏临山河,蒙佛心天子发帑重修梵宇,直得孤峰起舞,顽石点头;以至万象森罗,无不均然踊跃。山僧忍俊不禁,特与诸人通个消息。且道知恩报恩一句,又作么生?”起身合掌道:“莫谓圣恩何以报,大家努力透重关。”

## ►清代普陀山进贡白莲子的数量和时间

物以稀为贵,海天佛国莲池所出产的莲子以“瑞莲”而著称,但海印池面积有限,其产量并不高,因此每年进贡的数量也不会太多。清初诗人全祖望说,普陀僧人每年要进贡一斗洛迦莲子到北京,以祝皇帝万寿。全祖望在《四明贡物——洛迦莲》一诗中全:

“洛迦莲子青璠瑜,五色连枝馥香腴。十丈长符韩子句,一轮大合竺国书。海山天旷风云气,半向此间作储胥。洛迦释子荷帝德,年年一斗附使车。望阙焚香祝万寿,其视负暄之献则已侈。”

全祖望(1705~1755),清代学者、文学

家。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雍正七年选贡入都,乾隆元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很有才能。

“负暄之献”,典故出自《列子·杨朱》,原指把冬天晒太阳取暖当成一种好方法献给国君,后用来谦称自己的贡献很微小,也比喻所献的东西并不贵重。全祖望说,僧人进贡洛迦莲子礼物虽轻,但“洛迦释子荷帝德”,他们出于感恩之心祝皇帝万寿的分量却很重。因此,皇帝应该也很喜欢。

一斗莲子大约多少斤呢?按照一斗米计算,一升米现在重1.25斤,10升米为一斗,一斗重12.5斤。实际上,每年普陀山

进贡白莲子的数量并不是按照“斗”来计算。

关于赠送白莲子的数量,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题录上看,有明确为“一匣”或“一瓶”。如,这批档案中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初十日,杭州织造广泰“奏为普陀山普济寺僧人达桂送到白莲子一匣敬谨代进事”,便明确表明数量单位为“一匣”。

又,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初六日,杭州织造赫达塞有“奏为普陀罗迦山普济寺僧实劲恭捧莲子一瓶代为进呈事”,其代为进呈的白莲子数量是“一瓶”。由此也可

## ►杭州织造代为普陀山进贡白莲子

从代为进呈的官员身份来看,这批档案显示大多数官员是“杭州织造”。偶尔由浙江巡抚代为呈献。如,嘉庆五年浙江巡抚阮元“奏为普陀山普济寺送到白莲子一匣遵例代进事”。偶尔也有以“护理浙江盐政织造”身份代为进贡。如,嘉庆十四年护理浙江盐政织造清安泰“奏为普陀山普济寺送到白莲子一匣遵例代进事”,说明这也是遵例代进。“护理浙江盐政织造”这一官称,则与杭州织造的职能调整有关,清安泰后来也曾以浙江巡抚身份代进普陀白莲子。

普陀贡莲进京,多依托杭州织造办理恭进。清代乾隆年间的定海进士陈庆槐有《舟山竹枝词》诗歌,其中一首就是反映这一现象。诗歌这样写道:

“莲子香清忆普陀,锦函贡入上方多。杭州织造门前路,听说山僧岁岁过。”自注:“普陀贡莲,由杭州织造府恭进”。

普陀贡莲由杭州织造府恭进,一方面是因为杭州织造对于清代普陀山的兴建颇有贡献,有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也与杭州织造的职能有关。

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于江宁、杭州、苏州三地设立“织造处”,各设五品织造官一名,专门为朝廷督造各类御用纺织品,通称江南三织造。看起来这只是宫廷派出的一个采办机构,江南三织造的官位也不高,但其人选由北京内务府点派,均由皇帝心腹担任。康熙还让江南织造兼管盐务、钞关等事务。雍正七年,以南、北新关交杭州织造兼收,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杭州织造改归盐政,南、北新关交巡抚管理,至道光元年(1821),裁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仍兼管南、北新关税务。杭州织造一度还兼管浙闽海疆事。

此外,三织造处还负责宫廷用品之采办,如皇帝所用的绢纸、笔、墨、砚、朱砂等各种交予采办的一切物品。

担任江南三处织造的官员,均为皇帝的亲信,特别是在康熙时期,三处织造成了

皇帝安插在江南地区的耳目,他们搜集地方情况,监视官场活动,密报地方民情等等。正是借助于这种地位,普陀贡莲的进贡才能畅通无阻,“洛迦释子荷帝德,年年一斗附使车”。可以说,杭州织造几乎成为当时普陀贡莲的唯一直供渠道。

杭州织造与普陀结缘,也有历史背景,这与当初康熙时期的普陀修复工程有关。作为皇帝的耳目,历任杭州织造多次受康熙皇帝的委托,承办有关普陀山的事情。这也是普陀山僧人与杭州织造特别有缘的历史原因。因此,向皇帝进贡莲子作为每年谢恩的传统,后来均委托由杭州织造恭进。正如定海进士陈庆槐所云:“杭州织造门前路,听说山僧岁岁过”。历任杭州织造教福、孙文成等曾经多次到过普陀山,为振兴普陀观音道场做了不少事。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命鸿胪寺序班、雕刻大师朱圭镌刻御碑一块,差杭州织造教福送至普陀,并御书《心经》两部等赐予普济、法雨两寺。江国楨为赋《同织造府送御碑至普陀》诗:“一色茫茫作堆看,潮涌去看潮回。乘槎不见风波险,捧得君王睿藻来。”题中的织造府,即时任杭州织造教福。康熙御碑曾置于法雨寺前的万寿亭,该碑后毁,现存为重刻作品。

康熙四十七年,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杭州织造孙文成,苏州织造李煦,奉康熙旨意,督办贡送观音佛像给普陀山。范昌治为撰《同部堂孙公送内造佛像入山恭记》诗,题中的“部堂孙公”,即杭州织造孙文成。据《普陀洛迦新志》称,这两尊佛像,“连座高一丈六尺,佛身五尺,量圣体装就,脱纱,泥金,手足皆附。金莲玻璃点目,金皮作衣”,于四月十八日,分供前、后两寺圆通殿(今佛像已失)。

杭州织造孙文成为普陀山寺僧做了很多贡献。康熙年间,因严禁粮食出口,不许各地粮米装运出海。普陀山米粮短少,僧众多有散去。法雨寺住持性统在北京觐见

康熙,反映了这一问题。康熙当即就批示给孙文成,委托他好好解决普陀山僧众的吃饭问题。孙文成会同各方商定,“普济寺、法雨寺,现在僧人共六百六十六众,每日每人食米一升。合算一年,共需用米二千三百九十七石六斗。其米每年陆续运载。巡抚差官查验,给与执照,许放出海,永为定例”,并报康熙批准每年遵行。此外,孙文成还通过朝廷减免寺僧在朱家尖顺母涂开垦田地钱粮。

杭州织造与普陀山有缘,且织造本身就负有采办宫廷用品之职能,为普陀山代进贡莲就成了杭州织造每年的一项任务。这批档案资料显示,先后担任杭州织造、代进贡莲的官员有:

雍正年间:隆升(十三年)乾隆年间:苏赫讷(二年、三年)、申祺(十五年)、西宁(二十七年)、赫达塞(二十八年)、寅著(三十八年)、四德(四十五年)、盛住(四十九年)、伊龄阿(五十一年)、额尔登布(五十二年、五十三年)、基厚(五十六年)、全德(五十八年)、吉庆(五十九年)、岳谦(六十年)等。

嘉庆年间:苏楞额(元年、三年、十五年、十六年)、清安泰(八年)、常显(九年、十年、十七年、十九年)、三义助(十二年)、索诺木扎木楚(十四年)、广泰(二十一、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等。

道光年间:福德(元年)  
在这些档案文献的题名中,也涉及不少普济寺僧人名,这些僧人可能也是当时普济寺的住持。如,乾隆二十八年,杭州织造赫达塞有“奏为普陀罗迦山普济寺僧实劲恭捧莲子一瓶代为进呈事”。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杭州织造四德“奏为代进普济寺僧际龙应贡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九年,杭州织造常显“奏为遵例代普陀山普济寺僧人政进送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十年,杭州织造常显“奏为遵例代普济寺僧人显贤进送到白莲子一匣事”。

见,普陀山白莲子的包装,或用匣子,或用陶瓷瓶装,其数量可能不足一斗。

每年普陀进奉白莲子的时间,多在当年农历九月、十月间,由普陀山到杭州,再由杭州送往北京,千里迢迢,奏报朝廷则往往延后数日。这批档案中,时间最早的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初一日,时任杭州织造基厚“奏为普陀僧人进贡白莲子事”。时间最晚的,是道光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杭州织造福德“奏为代普济寺僧人贡进白莲子事”,这也是这批档案中最后一次记录普陀山莲子进贡之事。此后普陀山是否还每年进贡莲子,待考。

嘉庆二十年,浙江巡抚颜检“奏为代进普济寺僧人达坚呈送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奏为普陀山普济寺僧人达圆送到白莲子一匣敬谨代进事”,这三年的奏本标题一模一样,也可见贡莲一事确实是属于“例行公事”。嘉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为杭州织造广泰所奏;嘉庆二十三年,为浙江巡抚程国仁所奏。

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杭州织造广泰“奏为遵例代进普济寺僧人达桂送到白莲子一匣事”。

本文的写作,仅仅是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普陀白莲有关档案的题录进行整理、分析,结合清代普陀山史料对普陀贡莲进行阐述,因此所述内容也是比较肤浅的。这些珍贵档案的内容更值得挖掘研究,希冀有心人士能够前往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获得档案文本的基础上,对普陀贡莲作更深入的研究,也为普陀山佛教文化提供更多基础性资料。

# 文史 天地

主办

区政协文史  
与学习委

### 参考文献:

- [1] 王自夫,普陀贡莲与杭州织造,舟山档案史志网 <http://zsda.zhoushan.gov.cn/col/col1314436/index.html?uid=4290022&pagenum=1>,2013-07-22
- [2] 张坚,普陀山史话,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08,第82页
- [3] 王亨彦辑;苏云,梅重点校,普陀洛迦新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0.06,第184页
- [4] 王连胜主编.普陀山大辞典[M].合肥:黄山书社,2015.09,第288-289页
- [5] 刘子扬著,清代地方官制考,故宫出版社,2014.03,第468页